

# 當本土成爲主流價值

## ——借鏡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發展

楊聰榮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 壹、前言

澳大利亞（以下簡稱澳洲）與台灣有許多可以比較的地方。澳洲與台灣儘管國土面積相差很多，仍然有不少相近之處，可做爲比較的共同基礎。比如說人口總數，澳洲與台灣都是約二千多萬人，台灣略勝一籌，但差別不算大。說到原住民，大約都有人口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原住民人口，比例也是相當接近，而原住民就組成結構而言，台灣比較接近澳洲，即原住民內部族群眾多，難以找到共同的語言與文化特質，保存與發揚都有較大的難度，不似紐西蘭一般，以毛利文化爲原住民代表即可。除了原住民以外，還有移民的存在，都是晚近才發生的問題。台灣的東南亞移民與澳洲的亞裔移民問題有類似的部分，主要是由於新移民者與主流社會有相當程度的文化差異。除了新移民的問題之外，有舊的移民問題持續影響，台灣的外省移民與澳洲的英裔移民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隱隱涉及政治前途的主張，台灣的統獨議題與澳洲的保皇議題應該可以對應參考。最重要的相近之處，是這些族群問題的背後，涉及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問題。

這其中有關澳洲本土文化認同的建立，應爲值得參考比較的主題之一。早期澳洲是英國流放罪犯的地方，是對歐洲而言是遙遠的地方，也是文明不發達的地區，於是澳洲很長的時期存在著歐洲優位的文化觀念。這種觀念長期存在澳洲，使得早期的澳洲並未建立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觀念，即使在 1901 年獨立建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真正地發展出對自身文化的自信。同樣地面對強勢的宗主國文化，澳洲卻能夠漸漸發展出一種以本地經驗爲依歸的文化認同，這個過程時間很長，也經過了不少轉折，但可以說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之間，是快速發展的時期，澳洲發展出新的文化觀念，逐步形成改變。

在這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一種以澳洲經驗爲核心的澳洲史觀發展出來，澳洲也重新審視澳洲所在的地理位置，檢討澳洲與亞洲的關係，從而放棄長期以來爲人所詬病的白澳政策，改變單一文化傳統的政策，而改爲採取多元文化政策，另

外一個改變的來源，來自澳洲原住民，由於對澳洲原住民的歷史處境有反省，到後來接受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在澳洲文化認同中居於重要核心地位。本文認為在這個轉變之中，構成刺激澳洲建立自己的獨特文化中，亞洲移民所形塑的多元文化，以及澳洲原住民本身的獨特性，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將以專章討論其影響的作用。

同時，在這個建立獨特文化傳統的同時，澳洲並未放棄其原有的文化傳統，但是設法對於在這其中引起的爭論與衝突，加以調整，而尋求自己的步調。在這其中有因為調整之中而產生的不同事件，本論文認為應該加以檢討，才能以宏觀的角度，理解在歷史洪流中對於其中的問題，有比較清晰的理解。在本論文中，將檢討兩個不同性質的個案，一個是單一民族黨的興起，一個是共和主義運動的發展。這兩種議題的發展，一個是少數支持，卻引起很大的注意，另一個是多數支持，結果卻出乎外界的預料。在本文中的討論認為，這兩個事件應該加以特殊的解釋才能明白，同時仍然可以對照大方向的发展，從這兩個例子中看到，澳洲社會對於多元文化的逆流所採取的因應之道，以及面對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落差，澳洲有自己的方式來對面。

## 貳、從澳洲史的角度看澳洲認同的建立

儘管有不少研究顯示，澳洲早在十九世紀就出現了澳洲本地認同（Michie, 2000），而且這一認同導致了澳洲在 1900 年的獨立。不過在這個時候的澳洲認同與我們今日所討論的澳洲文化認同有很大的區別，當時澳洲的獨立祇是政治上建立了一個英國式獨立運作的體制，但是當時澳洲從人群組合、生活習慣、文化觀念到政治運作，都是理所當然的英國式的。因此，澳洲的獨立與紐西蘭一樣，以英國女王為國家元首，國旗上是米字旗為主體，同樣是大不列顛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一員，英國有任何的外交與軍事上的行動，澳洲與紐西蘭一樣，都是以英國為馬首是瞻。在這種體制之下，最難克服的是，當時澳洲的文化認同，英式文化是最好的，本地事務相形見拙。

構成今日澳洲的文化認同，雖然表面上來看仍然是以英語為主，英美式的莊園生活型態為基底，文化的內涵卻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所使用的不少文化元素，都是在澳洲創造出來的經驗，而以綜合性而具有獨特風格的澳洲文化而著稱。這個澳洲文化有各種不同文化的影子，除了最早期英式文化，並且隨著不同地區的移民加入，配上了歐洲各地的文化，以及亞洲各群體的文化，和澳洲原住民文化，雖然有不同的文化元素的綜合，卻都是清楚地強調澳洲本地經驗。現今的澳洲文化具有自我個性，也極具自信。我們可以以澳洲在 2000 年的雪梨奧運會閉幕式為

展示澳洲文化的場景，在閉幕式時，一項一項澳洲人引以為傲而代表澳洲的文化象徵，在世人的眼光中大方展示出來，澳洲文化風格就在這個個別的文化象徵中清晰地表達出來。

由原來英式文化在澳洲的優越地位，到後來澳洲文化風格卓然成型，引以為傲。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在澳洲開發的早期，位於南半球而地處偏遠的澳洲，因為遠離歐洲大陸，相較於歐洲世界為蠻荒之地，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澳洲住民是以歐洲的眼光來看待自身。儘管在當時也明白當地原住民擁有獨特的文化，有自己一套與自然共處的生存之道，是樸實未經雕琢的文化內涵，但是當時並未得到重視，反而因為澳洲原始天然，原住民未發展出文字系統，無歐洲所定義的高水準文化，而極具歧視之能事。這是因為當時以歐洲主流白人文化為主要的參考架構，在英國人及其他歐洲移民進入澳洲後，因為當地缺乏與歐洲相仿，不但沒有珍惜本地的文化傳統，還致力於改造原住民的文化傳統。

在當時不但對待澳洲原住民，充滿歧視的眼光。對於澳洲本地的白人，也自我歧視。對於澳洲自身的歷史，早年也是不重視，而祇重視英國與歐洲文明史的教導。僅僅簡單提到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發現澳洲，進而佔地為王，將其納入英國殖民地一事。也在其間建構出早年拓荒時期冒險犯難的精神，掩蓋澳洲早期為罪犯流放之地，可以說仍然是以殖民母國（英國）來建構文化特徵，這是澳洲人民借鏡英國文化形成社會建構。

早期澳洲為英國流放囚犯之地，有一段時期澳洲人避談這一段歷史，也極力將澳洲打造成另一個英國，或是另一個歐洲。然而隨著新移入澳洲的住民，帶來許多不同地區的獨特文化，形成極為不同的文化景緻，因而慢慢發展出獨特的文化，重新定位族群，凝聚「澳洲人（Australian）」的形象與文化特質。1788年第一批移民中有 736 名流放犯人，一共 1030 人的船隊在雪梨附近登陸，早年許多澳洲人對這段歷史引以為恥，現在則是翻轉過來，如果家族歷史可以上溯到最早來的囚犯，不但不以為意，反而成為光榮盛事。新的共同生活經驗成為社會文化建構中重要一環，必須先凝聚土地上各族群的共識，才得以發展獨特文化，新移民來自四面八方，不僅歐洲、尚有亞洲東南亞移民，先借用殖民母國英國豐富文化內涵及歷史，先以英式風格為底本在融入各地區不同的元素，建立澳洲人的形象，形成澳洲的族群形象。

這種文化風格的轉變與歷史意識的轉變有相當程度的關連，都是經過長期的討論而發展。其中成為關鍵性的因素，長期刺激著澳洲知識界不斷的思考，來自澳洲自身經驗的反省，其中主要是澳洲與亞洲的關係。澳洲對於自我認同思想的

轉變，最後終於能夠改變原有的文化優位秩序，促成新文化意識的產生，能夠如此快速，其中澳洲開始反省其與亞洲的關係，做為積極的亞洲事務參與者，成為亞洲國家的親善鄰居，功不可沒（Theophanous, 1995），估計未來澳洲在吸收與消化亞洲文化，仍然會扮演最重要而積極的角色。澳洲對亞太地區事務的投注，以致於改變了澳洲原有的文化優位秩序，其重要性值得特別加以探討。

由澳洲的歷史來看，雖然澳洲在地理環境上是接近亞太地區，但是卻是由歐洲人在近代發現而建立殖民地，因此在文化和歷史上則更接近歐洲。從 1788 年首批英國移民在雪梨附近登陸後，澳洲的歷史就成為了一部移民的歷史，雖然澳洲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但是一直到晚近才承認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翻開澳洲的歷史，其實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認可，出現相當晚。早期在澳洲對移民都是採取同化政策，將澳洲視為白種人的國度，後來推到極致，就成為眾所周知的“白澳政策”，極力排斥非白種移民，制定了“聯邦移民限制法”，以各種入境條件的限制，達到限制非白人移民的目的。白澳政策由澳洲殖民時期，十九世紀末期，到 1901 年澳洲獨立，將各殖民地改為州，正式成立了聯邦政府，仍然持續此一政策。

到了 60 年代中，澳洲當局開始實行取消種族隔離的政策，但是仍要求移民接受澳洲的價值觀，將不同族裔背景的人同化到澳洲的文化中。這種以西方國家文化自居而看低亞洲國家價值觀的狀態，產生一種與亞洲地緣文化不相協調的情況。1973 年，移民部長 Al Grassby 正式從加拿大引進和推行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才算是將名聲狼藉的白澳政策廢除。在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下，澳洲政府認可所有的澳洲人都有權利表達和分享他們的獨立的文化傳統，包括民族語言和宗教信仰，而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機會（Jones, 1991: 14）。

於是澳洲就在極短的時間，由存在具有種族歧視政策的國家，變為政策上最開放的移民國家。促使澳洲改變政策的原因，固然存在著外在因素，但最重要的仍是由於澳洲內部的討論與反省，澳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經過一連串長期的辯論，所產生的新的認同方向，即認為自己雖然文化根底來自歐洲，但是和歐洲國家並不相同，而是亞太地區的國家，必須要對亞洲事務有更深切地瞭解和參與。七十年代澳洲白澳政策的廢除，不是受到外界的壓力而改變，而是澳洲自己認同的改變。而刺激澳洲思考認同問題的轉變，除了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與革命思潮之外，來自與亞洲關係的歷史也是重要的來源（Fletcher, 2001: 324-45）。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澳洲捲入亞洲戰場，亞洲事務成為澳洲主要對外事務的核心，這與歐洲國家的思惟大不相同，澳洲因而漸漸調整腳步，開始將心力放在亞太地區的事務。影響所及，這已經不止是澳洲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是民間人士致力推動

的方向。亞太經合論壇（APEC）即是在澳洲的提議下所創立，成爲區域內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這種認同的轉向使得民間人士對亞洲事務產生莫大的興趣，從語言文化的學習、友好團體的組織、經貿的往來、國際援助的參與到共同合作的計劃，都有很好的成績。最重要的是，對亞洲事務有長期的關注與承諾，成爲朝野的共識，這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 參、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

在澳洲多元文化主義仍存在著很多不同形式的爭議，直到現在爲止仍是如此。澳洲的移民政策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階段，才有今天的包含多元文化主義的澳洲認同。在政府的具體的政策推動下，多元文化主義成爲澳洲公民生活的一環，其中以在傳播事業上的成就最大，在澳洲生活的居民都可充分感受到多元文化主義在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廣播而言，澳洲在 1978 年，正式成立了播送四十多種語言的特種廣播服務電台（SBS Radio），在澳洲各地播出，後來 SBS 廣播電台更發展到播送六十八種地方和民族語言。而在電視方面，1980 年澳洲建立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多種語言節目廣播服務電視台（SBS TV），向澳洲觀眾播送從六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選出的用六十多種不同語言廣播的電視節目，同時向移民教授英語。SBS 電台和電視台的建立是澳洲政府貫徹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重要的一環，成爲各國參考與學習的對象（Stratton, 1998）。

除了由全國統一的廣播與電視之外，澳洲政府還鼓勵並資助移民和少數民族建立自己的廣播電視和電台，例如有些 AM 社區電台頻度就讓不同民族社團免費使用，讓他們播出自己語言的節目。而在廣播電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成就是塑造了一個可以提供多語服務的環境。爲了方便移民，各級政府機構均對移民提供翻譯服務，移民局的傳譯中心還提供二十四小時翻譯服務，盡量減少非英語背景的移民的種種不便。

澳洲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波折與轉折（Bett, 1999: 284）。其中影響較大的幾種爭議有，學者不同的言論，如 Geoffrey Blainey，Stephen Fitzgerald 和 Ghansan Hage。他們均從不同的角度對多元文化主義提出了異議。然而我們必須從社會的整體來觀察這些不同的言論。首先是 Geoffrey Blainey 用“亞洲化”來描述政府新改革的移民方案，他反對繼續從亞洲吸收移民，他認爲，如果政府不改變吸收移民的方向，澳洲將成爲真正“亞洲化”的國家（Blainey, 1985）。而 Stephen Fitzgerald 的報告則認爲，澳洲應該增加移民，但是移民應該表明願意執行澳洲的慣例，同時不應該取得澳洲的公民權（Bett, 1999: 280）。還有一位學者 Ghansan Hage 則強調指出，從十九世紀

開始，澳洲一直是白人統治，是個事實也是個傳統，土著和後來的少數族群不應該有權利參政和決定國家事務（Hage, 1998）。這些言論最後並沒有成為政府施政的主流方向，但是也代表了澳洲一部分人士的意見。

學者之間其實是存在著不同的意見，Katharine Bett 認為從不同地區來的移民給澳洲帶來了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的財富，澳洲本身就是一個多移民的國家，移民背景的知識分子對移民的情況更熟悉，應該更有權利決定國家的事務（Bett, 1999: 280）。另一位學者 Jon Stratton 也同樣批評說，澳洲本是一個移居者的社會，本身就存在著多民族，文化也有著不可改變的多樣性，執著於單一主流文化的論調，是和發展多元文化相衝突的，是不利於各族群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協調發展的（Stratton, 1998: 16）。儘管爭論不斷，澳洲大抵還是依照多元文化主義的步伐前進，我們必須注意，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主要是強調容忍，而不是要任何人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文化傳統，就實際的發展而言，原有的澳洲文化傳統的形式是保留下來，而是各種不同的文化豐富了主流文化的內容。原有的文化主流並沒有受到威脅，而是增加了不同的內容。實際上的狀況並非如學者所言的非此即彼，而是在動態的過程中取得某種平衡。

澳洲在本世紀七十年代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以來，澳大利亞的人口已從原來的八百萬人，增加到現在的二千萬人，已從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小國發展成為中型力量的國家（Theophanous, 1995: 33）。移民的前來開啓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向，多元文化主義又為多族群社會開展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在澳大利亞多元文化主義的背景下，各族群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各族群文化之間又能互相融合，相互促進，互補長短，澳洲主流文化也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精華，漸漸成為信心十足而具有獨特性的文化。

## 肆、從移民的角度看澳洲認同

澳洲是個以移民為主所構成的國家，並且號稱是多元移民所構成的國家，移民來自世界各國，除了現在被稱為「澳洲原住民」（Australia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其他都是後來的移民，因此理論上移民祇有先來後到的區別，不應區分誰是主人誰是客人，但在實質上卻非如此，澳洲經過英國白種人後裔為主的移民的開墾一百多年之後，才以聯邦的型態獨立建國，所以國家體制已經定型之後才有各地的移民大規模移入，所以澳洲有個清楚的主流社會，是以英式的文化為基底，經過在澳洲這種塊土地的淬煉而產生的所謂的澳式風格，後到的移民則都有機會體認這種澳式風格，並且認知主流社會的存在（Wooldrdge, 1998: 178-92）。

澳洲是個以歐洲白種人移民，尤其是英國移民為主所組成的國家，此外澳洲原住民和非白種人移民也是重要的組成成分，而非白人移民則以亞洲人最為顯著。其實澳洲的白種人移民從未間斷（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1993），除了來自英國和紐西蘭的移民持續成為最主要的移民之外，其他的白種人移民早期以來自西歐為主，如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都有不少移民，戰後是南歐移民為主，以義大利、希臘等為大宗，自八十年代以來，來自前蘇聯國家及東歐各國的移民快速增加（Kunz, 1998），最近則以南非和前南斯拉夫的移民為多。澳洲的非白種人移民以亞裔居多，就人口總數而言亞裔移民並不顯著（Inglis, 1992），亞裔移民之所以受到注目，並非基於移民太多，而是亞裔移民在外貌上和主流社會的白種人相較，顯得比較顯著，亞裔移民增加在大都會的街頭上即可感受到，但實際上亞裔移民的人口增加比例並不顯著。

亞裔移民之所以比較顯著，基於以下幾個事實：第一，除了亞裔移民以外，其他非白種人移民的人數很少，如來自非洲、中東以及中南美洲的移民人數很少，因此亞洲移民突顯出來，非白種人移民和亞洲移民經常被劃上等號。第二，絕大多數的亞洲移民是在七十年代後期，澳洲宣布正式廢止白澳政策之後才移民澳洲，亞裔移民的增加是對於過去單純以白種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而言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第三，亞裔移民喜歡住在大都會，也很容易有聚居的現象，商家用不同文字的招牌，來自亞洲各國的餐廳開張，提供和西式餐點極為不同的食物，甚至各大埠都有中國城以及亞洲食品店，都是顯而易見的。第四，部分亞裔移民具有商業背景，或是專業人士資格，易於進入傳統上第一代移民不易跨足的領域，如醫師、會計師、建築師或是金融投資等圈子，能見度較高。

白澳政策之前即留在澳洲的華裔移民人數終究有限（Wang, 1978），根據統計，人數最少時僅餘數千人，也受到澳洲社會的排斥（York, 1995），在當時澳洲社會不易見容異質文化下被同化，可以說直到白澳政策廢止之前，對後來的移民是採取同化政策（Inglis, 1967）。在白澳政策期間（1901-1973），對華人入境比較嚴格，僅有少數的華裔人士得以入境（York, 1992），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政策已經比較寬鬆，部分華人因為就學及工作關係而取得居留權，1999年當選新南威爾斯州參議員的黃肇強醫生（Dr. Peter Wong），以及同時當選的前雪梨市副市長曾筱龍（Henry Tsang），都是在這個時期移居澳洲，算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華裔移民。今日澳洲華人移民，主要還是在白澳政策正式廢止以後才有大批各地華人入境，構成今日澳洲華人的風貌（Barry, 1996）。

在白澳政策廢除之後，首先人數最多的一批移民是來自中南半島的移民，主要是以難民身分來到澳大利亞，尤其是西貢淪陷以後，大批越南船民向外奔逃，

其中不少人是華裔背景，澳洲以人道主義精神，主動協助亞洲國家處理難民收容問題，是澳洲參與亞洲事務的代表例證，也因此在這段時間，以難民身份來到澳洲的亞洲移民佔了多數，同樣情況的移民有來自柬埔寨、寮國和東帝汶。對澳洲社會而言，這是自白澳政策正式廢止以後人數最多的一批亞裔移民，以致於留給澳洲主流社會的印象最深刻，多年以後這個印象仍然留存，經常在論及亞裔移民時會提到這種難民印象。

八十年代初期，專業人士型的華裔移民漸漸增多，主要以來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或其他地區接受大不列顛國協教育的華裔人士，很多是具有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資格，具有這種資格的人士一方面易於移民到澳大利亞，另一方面稍早時星馬地區的族群政治也是造成許多人才滯外不歸的因素，這批人構成澳洲社會新的中產階級（Kee, 1988, 1992）。澳洲的亞洲移民如果和其他移民國家相比，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段期間的亞洲移民以來自東南亞的移民最多，而華裔移民也是由東南亞來的人數最多（Wang, 1992），是移民研究中的「二次移民」的極佳例證。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這段期間，明顯地來自中港台的移民構成了華裔新移民的主要成份，此外來自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人都為數不少。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主要是由留學、讀英語以及打工的中國公民，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力爭而取得澳洲居留權，構成人數最多的一批新移民，約有四萬人，加上這幾年親屬團聚，人數可能在十萬之譜（Fung, 1996）。來自香港的移民則是受到 1984 年中英聯合談判到香港 1997 政權轉移的事件影響，一段時間每年有持續穩定的移民來到澳大利亞，移民則和階層都有，從富豪到勞工階層都有。來自台灣的移民在人數上雖然較少，但是因為符合移民資格以商業投資移民為主，新移民的經濟比較寬裕，活動力也很強（Giese, 1996）。

因此澳洲華裔社群的組成和政府的統計數據有相當的差距，澳洲的統計數據以出生地為分類標準，其中亞裔人口來自亞洲各國都有，從政府出版品的統計資料我們看不出有多少華裔人口存在，然而實際上，由星馬來的移民以華裔佔絕大部分，馬來人很少，同樣的情況印度尼西亞的移民也是以華裔為主。至於從「印支三邦」（Indochina，即越寮棉三地）來的移民，其中也有不少華裔，在澳洲多稱為印支華人，惟實際人數無法得知，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可看出許多成員很容易同時參與華裔社區及印支移民社區的活動，和這兩個社區的成員通婚的比例都很高，華裔的限界有時不是太清楚，同樣的情況也在來自菲律賓和東帝汶的移民社群中出現，這顯示澳洲華裔和澳洲亞裔的密切關係，因此有時候在指涉澳洲華裔時常常要以澳洲亞裔來代替，顯示了澳洲華裔的多元風貌（Coughlan, 1992）。相



關的研究顯示，早期留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很早就有澳洲華人認同的觀念（Yuan, 1998），在較小範圍的社區研究也顯示不同背景的華人有各種不同層面的互動關係（Mo, 1994, Ip, 1994）。在日常生活上也許華人參加各種不同社團，和自己鄉親互動為主，未必會和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問問。

對待移民政策的改變，可以由語言的政策看出來，50年代的澳洲人以“同化政策”對待英國以外的歐洲移民，要他們改變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如果東歐或南歐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已的語言講話，澳洲人會極為反感，常常不客氣的打斷他們，要他們講英語。越南戰爭之後，澳洲人的寬容心大大增強，開始承認各國移民帶來的風俗習慣和服裝飲食豐富了澳洲的社會生活，對英國之外的文化已經從排斥到接納。對原住民文化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67年工黨和自由黨－鄉村黨聯盟都先後放棄了同化政策，給予原住民權利。1972年放棄白澳政策。移民語言的重要，以下的資料是由2001年澳洲人口普查資料而來。這時澳洲人口約二千萬，其中16%在家中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約有超過240種不同語言被使用。

#### 移民語言使用前十名

Italian	353,606
Greek	263,718
Cantonese	225,307
Arabic	209,371
Vietnamese	174,236
Mandarin	139,288
Spanish	93,595
Tagalog	78,879
German	76,444
Macedonian	71,994

移民團體中，華人應該是最大的一群，因為將廣東話及普通話等加起來，已經成為最大的群體，約有四十萬人，佔澳洲人口的2.1%。其次是義大利人與希臘，Italian（352,605; 1.9%），Greek（263,717; 1.4%）。原住民中包含原住民及海峽島人（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原住民佔澳洲人口的2.2%，population約410,000人，2002年調查，有21%（94,000）原住民可以使用族語。其中祇有50,000使用原住民語使其族語為主要語言。移民家庭語言而言，據2001年資料，有四百萬人口，即澳洲的百分之二十是在海外出生。其中也有很多移民家庭使用英語為主要家庭語言。

海外出生的移民家庭，是使用以英語以外的語言的家庭中的主流。多元主義

到多語主義，1970 年度開始，澳洲政府正式認可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各種不同的語言即是重要資產。鼓勵保留原有文化，也在電視廣播中呈現，電視方面，兩家公有電視台，ABC 及 SBS，有少數不是英語以外的節目，廣播也是多語政策的實踐採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因此具有雙語能力者，被認為是優點。政府支持：政府投入資金與資料，更多人可以得到好處。

族群語言學校（ethnic schools）是主要教授移民子女語言的地方，主要是在下課後或是週末來進行。據估計現在全澳洲約有十萬個學童參加族群語言學校。也有主流學校（mainstream school）開設族群語言，通常一週兩三個小時。族群語言學校對所有語言背景成員開放。目前有超過六十種語言的族群學校，大部分分佈在族群社區附近。族群學校多半由族群社團來組織。政府會資助族群語言學校。

對於亞洲移民的語言採取的政策，也會影響到其他族群對於相關外語的學習，外語的學習，向來是採取志願性的學習方式。而學校可以決定學校自己選定的非英語的語言課程，現在非英語的語言課程已經列入小學八大學習領域之一，學生有機會學習到其他各國語言。以往是以歐洲語言為主流，現在日語、華語及印尼語是大宗，明顯地改變了文化上的氣氛。

## 伍、從澳洲原住民的角度看澳洲認同

澳洲原住民（indigenous Australians）與澳洲主流社會的關係，由早年的關係來說也是惡名昭彰，例如塔斯瑪尼亞的原住民被滅絕，原住民的土地被侵占，原住民沒有公民權，原住民的小孩被帶離原生家庭，種種惡行罄竹難書。原住民早年在澳洲並沒有被當成人來看，所以既沒有公民權，也沒有出現在國家統計資料中，直到 1967 年以後才有公民權。澳洲原住民與澳洲主流社會的關係，實際上很複雜，應該有專文更細緻的討論。然而從大方向來說，在澳洲反省自身的文化觀念時，澳洲原住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採行了多元文化主義之後，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傳統，反而成為澳洲文化發展獨特性的核心。

現在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成為澳洲文化表現特色的核心元素之一，在各種不同的國家慶典，可以看到原住民文化的展顏，各種重要的禮品店也會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產品，而且其文化特質受到法律的保障，可以說原住民的文化，現在成為澳洲文化的代表之一。這種情況的發展是最近二十年努力的結果，反而成為其他國家考察原住民與國家關係的對象。由原住民文化在澳洲當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這段時期間的變化，可以看出澳洲發展出澳洲新文化認同的前後時期的轉變。

澳洲原住民文化構成澳洲文化主體的重要成份，這並不表示澳洲原住民已經

接受了澳洲政府為他們所做的平反與和解。相反地，歷史上澳洲原住民受到不公義的對待，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清理。目前澳洲原住民與主流社會的關係，可以用澳洲的運動選手 Cathy Freeman 在 1994 年加拿大舉行的國協運動會（1994 Victoria Canada Commonwealth Games）上的歷史場景為代表，Cathy Freeman 在奪下 400 米金牌後，在勝利繞場時身披兩面旗，一面是澳洲國旗，另一面是代表原住民的土地太陽旗。澳洲原住民是澳洲認同的重要核心，但是澳洲原住民保有自己的認同，他們和澳洲主流社會的關係，還待進一步的平反、道歉與和解。

除了歷史問題未安頓以外，澳洲原住民的現狀也值得關注，澳洲原住民是澳洲經濟狀況最不好的一群人，失業率高、低收入及高失學率。各種社會問題，如犯罪率高、毒品問題以及家庭暴力等，都顯示原住民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一群人，即使現在做了各種努力，問題仍然很多。

文化保存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威脅，以語言為例，原住民語從白人進入澳洲時就開始衰亡，因此已經超過兩百年的衰亡期。現在可以有九十種原住民語存在，但是大約祇有二十種原住民語可以保存較好，即可以進行代間傳承。原住民語中，大約有七十多種原住民語已經面臨死亡。主要是年輕人已經不再說原住民語。也有幾種原住民語發展成混合語（creole）。多數的原住民保持使用原住民語，主要是住在北方及中部地區。原住民語語言使用與人口分佈有關，也與都市化的程度有關。絕大多數人都可使用英語。澳洲原住民語言發展的主要困境，是沒有一個多人共用的原住民語，如紐西蘭的毛利語。主要困境，對大多數的原住民語言，祇有數千人的使用者。原住民祇要認為有需要，可以向教育當局提出申請，請求原住民語言教育的協助，但是主流的教育仍然保持。原住民語言教育對於兒童及年青人強調語言教育機會的提供，但不要因此而失去其在現代社會的機會。

然而雖然就族語而言，前景不樂觀，但是這是所有少數族群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然而，澳洲原住民的語言雖然慢慢走向衰亡，但是語言景觀卻得到了較好的發展，語言景觀是指在公共場合可以看到原住民語言的使用（public us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路名、標題等愛用原住民語言，語言的使用與語言的地位同時提高，語言不祇是用說的，也可以是用看的。語言景觀對於發展澳洲的文化獨特性有很重要的地位，原住民語言大量被採用，使得談到澳洲的地名，就會出現富含原住民色彩的名字，對於增加澳洲的原住民風貌，有十分正面的協助。

雖然傳統的澳洲原住民文化正在衰亡中，而越來越多的澳洲原住民搬到都會區來居住，也使得澳洲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形態使了很大的改變，但是傳統文化卻有新的形式的發展。當原住民議題形成一種社會運動，某些原住民的文化元素成為泛原住民的共同認同對象，甚至成為原住民的文化象徵，例如澳洲原住民的竹

筒樂器 (Didjeridu)，就成為重要的澳洲原住民文化象徵，其造型及其音色，都成為大量複製的符號 (Lindheimer, 2000)。由於這些發展，使得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提昇到代表澳洲文化獨特性的地位。

###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逆流：「單一民族黨」的興起

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與新澳洲認同的建立，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經過許多曲折的論辯與發展過程。其中 Pauline Hanson 的反原住民與反亞裔移民的言論是代表性的事件，Pauline Hanson 所代表的單一民族黨 (One Nation Party) 則強調，澳洲應限制亞洲移民和停止對土著人的優惠，移民只能說英文，更不應該保持自己的文化。主要是在 1996 年 9 月，以新當選的獨立女眾議員的身分在國會發表演說，反對多元文化主義，表示澳洲正在有被亞裔人士「淹沒」的危機 (Hanson, 1997)。Pauline Hanson 與「單一民族黨」的興起是澳大利亞政壇自廢除白澳政策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現象 (Manne, 1998: 3-9)。「單一民族黨」反對亞裔移民的言論被認為是澳大利亞採行多元文化主義最大的挑戰 (Sheridan, 1998: 169-170)

「單一民族黨」的興起，是自從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之後，提倡多元文化主義之後最大的逆流，各界的解釋出現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單一民族黨」的興起是一個意外，是兩黨政治技術失誤加上媒體炒作，才使「單一民族黨」的言論得到了舞台 (Pattel-Gray, 1997)。也有人認為「單一民族黨」的興起在澳大利亞有其源頭和社會基礎，除了歷史上揮之不去的白種人優越感傳統作祟，以及過去長期白澳政策以來所養成的封閉排外心態之外，還有近年來因為經濟困頓以及失業率高居不下的挫折感。當 Pauline Hanson 發表這篇煽動性演辭時，澳洲政府坐視不理，澳洲總理霍華德 (John Howard) 當時拒絕指摘 Pauline Hanson，只表示她有言論自由。隨後 Pauline Hanson 所挑起的火頭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引起亞洲地區人士的廣泛關注，很多澳洲人才感覺，澳洲致力為國家營造一個友善的多種族及多元文化形象而長期苦心經營，卻被 Pauline Hanson 廉價的種族主義爭論而破壞於一旦 (Goot, 1997: 53)。

Pauline Hanson 在 1997 年 4 月成立「單一民族黨」，原來並不特別引人注意，真正讓「單一民族黨」坐大的是澳大利亞兩大黨的惡質競爭，「單一民族黨」成軍的第一次操兵是 1998 年 6 月昆士蘭州的大選，當時聯盟黨的主要政黨自由黨自忖可能會輸給工黨，因此想要拉攏其他的小黨，因此把優先票撥給「單一民族黨」，其算盤是寧可讓「單一民族黨」多幾個席次，也不願工黨上台，以換取「單一民族黨」的優先票，因此「單一民族黨」的興起，聯盟黨難辭其咎 (Allum, 1998: 1-3)。聯邦總理也是自由黨黨魁何華德沒有制止這種做法，祇說是由各州的自由黨人自行決定，言下之意，和「單一民族黨」換票祇是選舉策略，非關道德。選舉結果

是「單一民族黨」在選舉中異軍突起，得到成爲關鍵少數的席次，成爲該州第三大政治勢力。「單一民族黨」的候選人在地方選舉興起，主要和澳洲的選舉制度有關。

回顧「單一民族黨」在澳洲發展的歷史，「單一民族黨」很快興起，也很快消失。1997年以後其內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先後傳出「單一民族黨」的黨員對 Pauline Hanson 等所組成的領導班子深感不滿，要求重組領導階層，也有高層黨工對於內部財務狀況提出質疑，最後在昆士蘭州議會的「單一民族黨」在短短一年內，失掉逾半數席位，辭職及被開革的都有，最後很快地沒落了。「單一民族黨」現在已經沒落，反亞言論顯然吸引不了主流選民的注意，種族問題不是競選的主題。澳洲的小黨一般而言，既不可能執政，祇能從制衡角度來談，移民問題涉及道德問題，就成爲小黨集中焦點的地方。至於大黨爲什麼不願意多談移民問題及種族問題，原因是談了不見得能夠吸引到選票，說錯話反而很容易失分。於是澳洲的選舉，形成了大黨談稅制，小黨談移民及種族問題的場面。

單一民族黨在澳洲的興起與沒落，代表澳洲的多元文化路線已經爲社會主流所共同接受，偏激的言論固然好像一時之間得到不少迴響，但是事後證明，澳洲仍然是一個成熟的言論市場。所有的不同意見，僅止於言論層次，凡是不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意見，會自然沒落消失。單一民族黨的現象也反應，澳洲的新認同路線，其實是在社會的論辯與討論中形成，澳洲既然是多元民主社會，就會有各種不同的聲音。而由言論市場自由淘汰的方式，證明種族主義偏狹的單一民族黨最終難以在澳洲社會中得到足夠的支持。

## 陸、從共和運動的角度看澳洲認同

從國家定位而言，澳洲現在仍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英國女皇在澳洲的憲法上仍是國家元首，雖然在實際的運作上，英國女皇並未行使其權力，而是指派一個總督代表女皇行使權力，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也祇有禮儀上的功能。因此澳洲在政治現實上與台灣類似，都有名實不符的情況。澳洲也有一群人希望改變現狀，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君主立憲的運動，被稱爲共和主義，即主張澳洲應該是個獨立國家，以建立澳洲共和國爲職志。在澳洲的國旗上，也是英國的米字旗爲主調，表示其與英國的歷史關係，但是這是澳洲共和主義者希望改變的國家象徵符號。

澳洲的共和主義運動在 1999 年的公民投票中，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而沒有通過，然而共和主義運動仍在持續進行中。這個結果須要進一步的解釋，反對共和主義運動的人表示，他們也支持共和主義的理念，但是現在無意改變現狀，因爲

他們對於改變為共和主義後的情況無法確定。長期的共和主義運動雖然尚未成功，但是「澳大利亞優先」的價值早已深入民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共和主義運動雖然尚未成功，但是主流價值的建立更值得參考。澳洲如何能擺脫傳統的價值觀，改變過去移民總以英國標準為上的思惟，建立一個以澳大利亞為中心的認同體系，是值得參考的課題。

澳大利亞憲法改制共和的公民投票結果揭曉，多數人選擇了不改變現行憲法，努力了九年的共和主義運動宣告失敗，奇妙的是，各種民意測驗都顯示高達三分之二的民眾實際上是贊成共和制，然而民意測驗同樣也顯示共和制在公民投票會失敗，因此這個投票結果須要精巧的解釋。

早在共和制憲法改革尚未付諸公民投票以前，共和主義運動的成員信心滿滿，認為澳洲改制共和，天經地義，而且得到民眾高度支持，勝卷在握。而反對共和主義的保皇派，在當時被認為是守舊而不合時代潮流，祇有一小撮人做最後努力。各種民意測驗都顯示多數澳洲人認為澳洲應改制共和，現行君主立憲視英國女皇為國家元首不合時宜，應該加以改變。

然而從共和制憲改方案付諸公民投票以後，情況卻慢慢改變。由於共和制要付諸實現，必須清楚告知是那一種方案的共和制，為此在 1998 年初召開了制憲會議，會議似乎很成功，民間和政界大力支持，選出代表澳洲不同背景的代表同聚一堂，最後討論出一套共和方案出來。這個方案可以稱之為「最小改變方案」，為了減低民眾的排懼心理，這個方案基本上完全保留現行憲制的精神，祇是將國家元首改名為總統，由眾議院三分之二同意通過，其職權和現行英皇代表澳洲總督一樣，祇有象徵性的權力，參加儀典和簽署文件。

這個方案卻讓一部分強力主張共和制人士感到不滿，他們認為應該全民直選總統，民意測驗顯示這批人約有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二十。這個共和陣營的矛盾被保皇派利用上了，保皇派的競選策略從一開始就緊咬這點，廣告上不提任何與英國皇室有關的訊息，祇表示這種共和制不是澳洲人所要的，最後強調如果想要全民直選總統，就投反對票。這一招果然奏效，反對陣營最後有多名共和主義的大將大力投入，他們積極游說選民，要共和就要真正的共和，這個方案不好就要否決，形成反對派中有保皇運動和共和主義分子的景象。

這使得這場公民投票的訊息變得十分混亂，一直到投票前，各路人馬仍在爭辯，贊成是什麼意思，反對是什麼意思。贊成派說，贊成就是贊成共和，反對就是支持女皇，反對派說不是，贊成就是支持這種沒有實質改變的共和制，反對就是不支持理由不強烈的改變。選舉的結果顯示反對派的競選手段成功，將原來表示支持共和制的人數，約三分之二，減去支持總統直選的人數，差不多就是最後

公民投票的結果。於是澳洲仍然是君主憲政國家，象徵元首仍是英國女皇，一切都沒有改變，過去九年來聲勢浩大的共和主義運動，投注了無數的財力與人力，最後仍然回到原點。這個結果或許可以說澳洲人對憲政改革比較保守，如果改革方案不僅理想，多數人寧願保留現狀，卻不能單純地解釋為澳洲人對英國王室戀戀不忘。

澳洲這次公民投票顯示，公民投票對於解決複雜的憲政問題多麼有限。由於公民投票多半祇能將複雜的問題化約為是非題，對於民眾期待多種選擇的思考空間顯得無能為力，對於公民投票方案的不同解釋，祇能讓自由心證來決定。而公民投票也對希望改變現狀的一方比較不利，因為要改變現狀的一方必須說明是那一種改變方案，很容易顧此失彼，這才是這次澳洲共和改制失敗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亞公民投票否決了憲法改制共和的建議方案，這是出乎許多人原先的預料。多數澳洲人選擇了不改變現行憲法，因此澳洲仍是君主立憲國家，而國家元首仍是英國女皇。共和主義為何在公民投票會失敗，有公民投票制度設計的問題。

這次公民投票結果，共和制憲法改革方案大敗，在澳洲六個州之中祇有維多利亞州取得勝利，其他各州都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否決了這個方案。外國許多媒體表示，澳洲人仍對英國女皇情有獨鐘，這是錯誤的解釋，一般民意測驗顯示，澳洲祇有大約百分之十的人支持效忠英國王室，反對共和主義的保皇派，被認為是守舊而不合時代潮流。公民投票的失敗，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目前提出來的由國會選出總統的共和憲改方案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此一憲改方案沒有通過。

這種對澳洲傳統價值的肯定，而對於改革缺乏信心，可以從這次投票中清楚地看出，尤其在鄉村地區的投票最為明顯。這反應了澳洲重新肯定其原有根植西方的傳統價值的趨勢。過去有一段時間澳洲漸漸和西方傳統價值遠離，希望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後，現在又開始重新肯定西方傳統價值。重新肯定西方傳統價值，如民主與人權觀念。澳洲大力介入東帝汶問題，即是以人權觀念領軍，參加亞洲事務。澳洲將保留自身特色介入亞洲事務，澳洲在外交上的轉變無寧是很清楚的。澳洲人更不願意輕易嘗試看不到清楚利益的改變，而肯定目前澳洲現行制度，表現在本次公民投票上也是很清楚的轉變。對於共和主義運動主張要切斷和英國王室的關係，澳洲顯然對於自身源於西方的傳統顯得更有信心，然而這僅僅表示其理念成為澳洲的主流思想，種投票思惟方式是相當有澳洲特色，反應了澳洲民間不信任政治人物的傳統，而無疑地這種傳統也根源於西方的民主傳統。

## 柒、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澳洲的文化認同已經卓然成型，考察其歷史變化，今天澳洲文化認同的內涵，其實主要是在一個相對而言不算長的時間建立起來的。主要是由於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發展出來以澳洲自身文化經驗為主體的歷史觀，而由此歷史觀所觀照到的澳洲與亞洲的關係，促使澳洲改變移民政策，廢除白澳政策，接受各地移民而形成多元文化政策。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以接納各種不同文化，然而澳洲本地的文化傳統其實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充實下，其核心價值反而得到肯定，從而吸收各地的文化。其中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居於核心的位置，成為發展澳洲文化獨特性的關鍵。

Joanne Petitdemange 認為文化認同可以分成三個領域：發展（development）、表現（expression）和採證（evidence）。「文化認同是由諸如習俗、價值觀、傳統、態度、信仰和溝通方式等等無形的事物中，被發展（developed）出來的。文化認同透過藝術、文學、設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溝通系統（例如電視、報紙、網際網路、談話、公開會議）等等智識性的工具，被表達（expressed）出來。並且，文化認同藉由物質環境，諸如建築物、街景、風景和家庭器皿等日常用品等等，而被證明（evidence）出來。」不管是發展、表現、採證都必須是從澳洲本土化起始的，然後一步步達成共同的「文化認同」（Petitdemange, 1998: 49-60）。

1988 年澳洲白人移民赴澳二百周年紀念，澳洲政府重新整理國家主義的觀念和理論，最後由官方發表聲明，將澳大利亞描述為：

- 一、是一個誠摯地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國民之間尋求「和解」的國家。
- 二、一個多元、而非單一文化的國家。
- 三、一個公共生活中很少男女差異的國家。
- 四、由民族的網絡所建構成的國家，而非由截然的邊界和領土主權所界定的國家。
- 五、是個泛太平洋的亞洲國家，而並非「西方」國家。
- 六、是個具有高度文化意識的國家，並藉由文化想像界定國家共同體。

這些內容，是很清楚的澳洲新文化認同的重要面向。澳洲可以說是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內，將由澳洲本土經驗發展出來的澳洲文化認同，成為澳洲的主流社會價值，這個成就算是難能可貴的成就，否則一般而言，多少國家面對歐洲優位的文化，能有自信發展新的文化認同觀念。而澳洲文化認同的轉變，仍然是以澳洲自身的經驗出發，並沒有放棄原來的文化基底，但是卻以多元文化主義的立場，接受並吸納原住民與亞洲移民的文化，成為在國際舞台上，一個自信而有獨特文化內容的國家，是特別值得參考的文化轉變歷程。



## 參考文獻

- Allum, Margaret. 1998. "Hanson Can't Be Ignored." *Green Left Weekly*, No. 332, pp. 1-3. September 9.
-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9. *Year Book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 Bett, K. 1999. *The Great Divide-Immigration Politics in Australia*. Sydney: Duffy & Snellgrove.
- Blainey, Geoffrey. 1984. *All for Australia*. Sydney: Methuen Haynes.
- 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s publication. 1993. *Australian Demography*. Sydney: 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s Publication.
- Coughlan, James E., ed. 1992. *The Diverse Asians: A Profile of Six Asia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Natha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Asia Relations, Griffith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Australian Diplomatic Digest: News and Events Defining Australian Diplomatic Practic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 Fletcher, Brian H. 2001. "Anglic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alia Since 1962."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October, Vol. 25, No. 3, pp. 324-45.
- Fung, Edmund S. K., and Chen Jie. 1996. *Changing Perceptions: The Attitudes of the PRC Chinese Towards Australia and China, 1989-1996*.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Asia Relations.
- Giese, Diana, Astronauts. 1996. *Lost Souls & Dragons: Voices of Today's Chinese Australians in Conversations with Diana Giese*.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 Goot, Murray. 1997. "Hanson's Heartland: Who's for One Nation and Why"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pp. 53.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 Hanson, Pauline. 1997. "Australia, Wake Up!" Pauline Hanson maiden speech to Australian Federal Parliament, Tuesday 10th September 1996, 5.15 p.m. In Hanson, Pauline, *Pauline Hanson--the Truth on Asian Immigration, the Aboriginal Question, the Gun Debate and the Future of Australia*. Ipswich, Qld.: P. Hanson.
- Huddy, Leonie. 2001. "From Social to Political Identi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March 2001, No. 22, pp. 127-48.
- Inglis, Christine Brenda. 1967. *The Darwin Chinese: A Study Of Assimilation*.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Inglis, Christine, ed. 1992. *Asians in Australia: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Ip, David, and Constance Lever-Tracy, Trailblazing. 1994. *Into China: Networks and Linkages of Smaller Diaspora Firms*. Murdoch, W.A.: Asia Research Centre, 1994.
- Jones, Barrie. 1991. "SBS: Coping with a Strange Idea," in Goodman, Goodman, D; O'Hearn D. J., Wallace-Crabble, C, eds.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Newham: Scribe Publication Pty Ltd.
- Kee Poo Kong. 1988.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Construction of a Socio-economic Profile*. Canberra: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Dep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 Kee, Poo Kong. 1992. *Home Ownership and Housing Conditions of Immigrants and Australian-bor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t. Pub. Service.
- Kee, Poo Kong. 1992. *Social and Economic Attainments of Immigrant and Later-generation Australian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t. Pub. Service.
- Kunz, E. F. 1988. *Pisplaced Persons: Calwell's New Australians*. Sydne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Lindheimer, Joel. 2000. *The Didjeridu: From 'Dreamtime' to a New Emblem of Pan-Australian Aboriginal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 Manne, Robert. 1998. "Foreword,"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pp. 3-9.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 Michie, Helena. 2000. *Antipodal England: Emigration, Gender, and Portable Domesticity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ustralia)*. Thesis (Ph.D.) Rice University.
- Mo, Yimei. 1994. *Self-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in Tasmania*. Canberra: ANU thesis.
- Pattel-Gray, Anne. 1997.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s in Australia."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s*, Issue 97, No. 3, pp. 36-41.
- Petitdemange, Joanne. 1998. "Cultural Identity," in Ruth Rentschler, ed. *Shaping Culture Arts &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pp. 49-60. Deakin: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 Shen, Yuan-Fang. 1998. *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 Chinese Australian Self-Representations*. Canberra: ANU PhD thesis.
- Sheridan, Greg. 1998. "Pauline Hans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ustralian Dream,"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pp. 169-70.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 Stratton, J, and Ang, I. 1998. "Multicultural Imagined Community-Cultural Differ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alia and the USA," in David Bennett, ed. *Multicultural States - 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Stratton, J. 1998. *Race Daze-Australia in Identity Crisis*. Sydney: Alken Press.
- Taft, Ronald. 1966. *From Stranger To Citizen: A Survey Of Studi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Western Australia*. London: Tavistock.
- Theophanous, Andrew C. 1995. *Understand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Australian Identity*. Elikia Books. Victoria.
- Wang, Gungwu. 1992.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NSW: Allen and Unwin.
- Wang, Sing-wu. 1978.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 Wooldrdge, Michael. 1998. "A Pathology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pp. 178-92. Melburne: Bookman Press.
- York, Barry. 1992.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1901-1957*.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 York, Barry. 1995. *Admissions and Exclusions: Asiatics and other Coloured Races in Australia: 1901 to 1946*.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 York, Barry. 1996. *From Assimilationism to Multiculturalism: Australian Experience 1945-1989*.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ustrali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